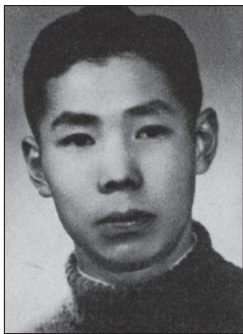


历经磨难一生 始终心向光明

——我的丈夫姚重华

○徐 琤（1946—1948 社会）



姚国安二十岁照



青年时期的徐琤

献身革命

抗战胜利后，1946年西南联大结束，清华复员回到北平。是年，我在上海考入清华外文系。我初次见到姚国安是在一次读书会上。会上他分析当前国内形势：国共矛盾、美国的态度、和谈的前途以及广大群众的思想倾向等。他思路清晰，有条有理。我注目看他，他五官很端正，双目有神。个子不高，穿一件陈旧的暗黄色的外套，好像是美军留下的救济物资，脚穿一双球鞋。

过了一段日子，有人介绍我参加民主青年同盟。这个组织，不同于公开的群众团体，我们有三个人的小组会，定期秘密碰头，组长是联大先修班来的尹淑慧。一天，尹要我去见他的上级联系人，说是有任务要我去做。一见面，尹的上级联系人原来就是那次读书会上做报告的姚国安。他是西南联大物理系的，比我高一届。我到他的住处去找他，他当时在生病，说是胸部神经痛，经常卧床。他宿舍的床上有一张小木桌子，是他自己设计请木匠做的，他坐起来正好可以在这桌上读书吃饭。我的任务是在他室内复抄收听来的新华社的广播记录。我有空就去，一星期几次。他同室的同学进进出出，看到我也无所谓，知道我在干什么。他的病似乎不轻，有时要我帮他在煤油炉上煮点面条给

重华原名姚国安，1927年2月22日出生于杭州一个铁路职工之家。五岁在杭州进小学，学习成绩甚优。抗战时随全家逃难，断断续续读完初中。1941年，14岁的他一人到浙江丽水进浙江省联商科学学校读高中，从此走上了独自漂泊的人生道路。由于对大后方比较向往，辗转从重庆考入西南联大。当时，在重庆报考西南联大物理系的有250多人，只有重华一人被录取。

他吃。他每天吃很多柑橘，说这对治神经痛有好处。所以听来似乎他过去生过这样的病，这次是复发。

他的病好了以后，我看他已很难把课业放在心上，因为有不少课业以外的事要他去做，如民主青年同盟的事、读书会的事、办西山书店的事。西山书店这个小小的文具店，暗底下出售当时违禁的书，如《共产党宣言》《论联合政府》《新民主主义论》等。他定期进城去进货，一个人大包小包地拎回来。进货的资金不够，他还得自己设法筹措。

1947年寒假，他曾去沧州解放区轮训班学习。凡去那里学习的人，往往是男女搭配，不易引起怀疑。与他一起去参加轮训的是陈金秀(陈明)，他们化装为兄妹去走亲戚。在过封锁线的地方得住宿一晚，他俩开的房间只有一张床，就只得“兄妹”同床。此事在熟人中传为佳话。以后几十年来，我们与陈明两家始终是情同手足。陈明老说：“姚重华这人特别实在。”

那时，我和他的关系是亲密的。我经常请他到海淀燕京大学后门一家小饭店改善生活，点他爱吃的糖醋里脊。他从城里买书回来常送我一两串冰糖葫芦。1948年初我20岁生日那天，有同学送我一张贺卡，上面写着：“人的一生最重要的是走自己的路，从各方面完成自己。”清华有块王国维的纪念碑，陈寅恪在上面写“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我觉得这十个字与贺卡上的祝词基本上吻合。重华有不同看法，他在这张贺卡上写：“应甘愿默默无闻地为人民做铺路石子，让别人在自己身上踩着前进。”

一天重华对我说，他早已参加共产

党，民主青年同盟是党的外围组织。他告诉我，在他入党宣誓的前几天，他思想斗争激烈，两个通宵没有合眼，最后才下了决心。他又说，由于他经常旷课，光学老师余瑞璜教授找他单独谈话，问他为什么不好好听课，连考试也不参加，为他表示惋惜。我问重华“你以后不能毕业，找不到工作，生活怎么办？”他却说：“干党的事业，党要我干啥就干啥。”在他人生的轨迹上，如铁路扳道岔一样，他已从追求科学这条道岔上，扳到献身共产党的道岔。

携手同行

当时京津一带的学生运动都是共产党的地下组织领导的。清华园的政治氛围同解放区差不离，大部分学生和部分老师都跟随这个潮流走，有些是自觉的，有些随大流，埋头读书不问政治的是少数。重华是实实在在的人，认定了，就血荐轩辕，无限忠诚。一天他对我说：“我俩今后能不能在一起，决定于你是否同我走一条路，这一点是毫不含糊的。”

1948年初夏，形势已很清楚，北京已临近解放。党组织要求部分党员南下到待解放区开辟工作。一天，重华对我说，一放暑假他就要走了，问我打算怎么样。我知道那些与我最要好的同学差不多都要走了，留下的人将面临难熬的寂寞和空虚，而且近来我也没有好好读书。心散了，还能把心收拢回来静心读书吗？汹涌的历史潮流已使清华安不下一张清静的书桌。我向重华表示，我也愿跟随南下。过了一天，他对我说，你下这个决心，组织上认为是一大进步，同意吸收你入党。我说，这，我还没有充分思想准备。他马上

□ 纪念清华园解放70周年

说：“那等以后再说。”

到上海的这批人，据后来知道，不久就分道扬镳了，有的去武汉，有的去广州、香港，重华去贵阳，梁燕已在那里等他。我和盛薇卿投考厦门大学，结果盛未考取。我只得一人去厦门，不过黄培正已在鼓浪屿等我。我是进了厦门大学后，才参加厦门地下党的。

进入虎穴

1948年6月，中央上海局决定派重华和梁燕到贵阳去，并交代贵阳的党组织已经破坏，所以到那里一切从头做起。贵阳是国民党的一个反动统治中心，谷正伦（曾任国民党的宪兵司令，当时是贵州省政府主席）、谷正纲（国民党中央委员）都是贵州人。有人说当时贵阳特务如麻，环境险恶。

由于接不上关系，寒假重华去香港找到钱英同志，奉命由重华牵头，加上安毅夫（浙江大学的，家在贵阳）、梁燕组成贵阳特支，其后又增加了黄培正和朱厚泽二人。

梁燕和重华都在贵阳清华中学找到教员的职务，就以此为据点开展工作。他们迅速又稳妥地建立了新民主主义青年联盟，并在联盟中间物色发展党员，其中朱厚泽是最先被发展入党的。他们还准备把工作从学校扩大到社会，做上层人物的工作。

在香港汇报工作时，钱英和朱语今几次提出，要重华不要再回贵阳了，转去北京参加全国青年代表大会。但他不愿意。他觉得在贵阳已初步做了些工作，有很多同志在等着他；北京已经换了天地，一片欢腾，而贵阳仍是险恶之地，黎明前的一刻更黑暗，他应该回去。

1949年6月，贵阳国民党特务果然下毒手了。一天，同学李惠华偶然发现特务在寻找重华的住处，厚泽得知这信息后立即告诉重华。重华认为自己已经暴露，决定和梁燕、培正一起迅速撤退。撤退前他同厚泽两人小心翼翼地把油印机和机密文件埋在校园的一个角落里。并对估计尚未暴露、留下的同志交代任务，要他们继续坚持下去。

在他们离开的第二天，敌人果真来到他们住处，但扑了个空。他们随即在全市进行了大搜捕。有些没有来得及撤退的同志被敌人逮捕，英勇地牺牲了。其中有位叫杜蓉的女同志，牺牲得尤其惨烈，她身患残疾，是躺在床上从事革命工作的。

重华离开贵阳后，工作由安毅夫负责。以后迫于形势，安也撤离了，工作交给厚泽负责。在厚泽领导下，新青盟的同志为迎接解放做了大量工作。解放后，新青盟的大多数同志成为贵阳市的党政领导骨干。

温馨的家

1949年6月，重华、黄培正、梁燕和在重庆工作的戴宜生一起从西南撤退，几经辗转又历尽艰险，终于在武汉中央华中局组织部找到了钱英。重华就留在了华中局（即以后的中南局）组织部工作。当时我早已从厦门到了武汉，在青年团市委工作。我和重华会面了，不久就决定结婚。我因之调到中南局宣传部工作。

中南局给了我们一个六七平方米的房间。房间里面有一张大床，一个书桌，两把椅子。结婚那天，几个同志送来一些糖果、花生、大枣，大家说说笑笑，婚礼用了半个小时就结束了。当时，我们的房间

里没有书橱，书怎么放呢？不几天，重华找到一块刨得很光滑的木板，设法装在墙壁上，作为书架。这个雀巢虽小，但整洁明亮，我们很称心满意。

1952年钱英调任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副书记，把重华和我一起带走，当她的秘书。不久，我又被调到中央组织部办公厅工作。第一个五年建设计划开始后，重华再三请求归队做技术工作。1954年，他调至第二机械工业部第五设计院，搞的是苏联支援的军事工程。从此他投入了新的领域，有很多很多新的东西需要他专心致志地去学习。开始一段时间，中组部和二机部都没有分住房给我们，我们都各自住在集体宿舍，只在周末才鹊桥相会。由于他的努力，不久就评上工程师，任工艺科科长，他负责的项目还得了奖。

1961年中央华东局在上海成立，重华和我先后调华东局组织部工作。从此，我们在上海又有了一个温暖的家。家里有我的老母，两个孩子小林和小春，还有一个保姆。

我们经常下乡蹲点调查。不少同志反映重华在农村不怕苦，调查能抓重点，落笔如神。杨东林同志还对我说：“我们下去调查回来，一起扯一扯，由老姚提笔写报告，还说好大约多少字。不一会儿，老姚就写好了，一气呵成，不涂改，连字数也差不多。对这一点，大家不能不折服。”

那几年农村生活很贫困，他得了肝炎。在杭州望江山肝炎疗养院疗养时，医生不准他看报读书，他为了解闷，用彩色尼龙丝编织小花篮。他心灵手巧，一只花篮里有很多花，每朵花有不同颜色的叶子、花瓣和花蕊，十分精致。他的手艺一下传遍了疗养院，医生、护士、病友争着

向他讨。他以后带了几只回家，现在，这些都成了珍藏品。他还用尼龙丝编了一只镜框，恰好可装三张照片，中间一张是我，左右两边是小林和小春稚气的笑脸。当时这镜框一直放在床头的柜子上，这就是他心爱的家。

1962年中央召开“七千人大会”总结大跃进的经验教训。为了贯彻这个会议，华东局组织部和宣传部各抽了一些人混合编组学习会议文件。我是其中的一员。开头总是反复动员，要大家解除顾虑，放开言路。我在讨论中的主要发言内容：一是认为党内缺乏民主，下情不能上达，第一书记说了算。二是对大跃进七分成绩、三分错误的评价有意见，究竟如何评价，将来历史自有结论。但不久风向又转了，中央提出“阶级斗争要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华东局组织部长罗毅找我个别谈话，对我在学习班上的发言作了批评。有一天，重华评论我说：“你这人思想很尖，人是透明的。”人生最贵是相知。

双双入狱

“七千人大会”才过去四年，文化大革命又来了。如果说反右斗争是残害知识分子的大灾难，大跃进是饿死几千万农民的大灾难，那文革就是一场史无前例的全民性的浩劫。这场革命开头是革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命，重华和我都是一般干部，还能平安过日子。

1968年清理中内层，矛头就对向我们了。我们自以为没有任何问题，其实早已经成为全华东局各部门共同的大目标。重华在正气中学是高才生，江西会考又名列第一，这样的人才，蒋经国还会不笼络发展为自己的党羽，暗中派进共产党做内

□ 纪念清华园解放70周年

线？徐琤在中央组织部工作多年，为部领导起草文件，而组织部领导安子文是刘少奇“黑帮”的成员，徐琤就是安子文安插在上海的“黑爪牙”。

一天晚上，有电话通知我们去开紧急会议。我们一到那里，就被隔离审查了。第二天，造反派押着我们回家抄家，把卧室壁橱的顶板捅破，原来是搜查有没有发报机。他们还向我们要高级照相机，哪知重华是个穷学生，从来没有摸过照相机。他们说学物理的哪有不玩照相机的？他们把书橱里的书一页一页乱翻，看看有没有密码之类。他们拿了一本书走，以为是黄色小说。重华在我耳边小声说：那是世界名著。他们只得无奈地再把我们押回去。

过了几天，他们在上海造反派头头王洪文那里办好了手续，就由拘留所把我们分别铐走了。在铐走前，要我在拘留证上签名，但上面未填拘留的根据是什么——我有什么罪行。

我和重华被关在同一个拘留所，男女监房是严格分开的。这里的生活应该说不如提篮桥监狱。提篮桥监狱关的都是判了刑的犯人，他们可以和家里人见面，接受家庭接济，还可以参加劳动，活络筋骨，空余时间有一定的自由度。看守所里的犯人则天天关在铁窗铁门之内，天没亮就吹哨起来，一直坐到吹哨睡觉，中间只让站起来在原地踏步，活动几分钟。看守所里放风的机会很少，个把星期一次，有时甚至一个月只有一次。看守所这里是名副其实的“坐牢”，坐得你屁股都起老茧。我曾被双手反铐45个日日夜夜，把双手臂反铐在背后，睡觉吃饭都不解铐，吃饭时只能把饭倒在脸盆里，人蹲在地上像狗一样

把饭舔光。睡觉只能侧睡，还把手臂压麻了。我在提审时申诉，他们推诿说是派出所的监规，我呼天不应、呼地不灵，蓬头散发几乎把人折磨成了鬼。

以后知道，男监房的条件比女监房更差。女监房铺地板，男监房是水泥地。坐在水泥地上风寒潮湿怎么不侵入下肢的骨髓？坐着干什么呢？不准与同监房的人说话，带来的《毛泽东选集》已经读了好多遍了，提出要几本马列主义原著，不同意。说毛泽东已发展了马列主义，为什么还要学习原著？难道不相信毛泽东思想吗？看守所伙食的营养当然是不足的，我半夜醒来经常饥肠辘辘。平时，早上是一漱口杯粥加两个咸萝卜头，中午和晚上是一盒烂饭上面加一些蔬菜，每周配给一片薄薄的咸肉。更糟的是每年四分之一的日子吃发霉的山芋片，代替米饭，发霉的东西是会致癌的。

1970年我出狱后，才得知保姆还在，由组织部发她工资和生活费。我只见到了小春，小林16岁就已去黑龙江插队了。那几年他们幸亏有外婆照顾，还能每星期天到大舅舅家过一天，得到慈祥的外婆和大舅全家的抚爱关怀。

我出狱时的“结论”是“敌我矛盾按人民内部处理”。1970年下半年，我离开干校，被分配到南汇县农业机械厂监督劳动。

1971年9月的一天，我接到通知：重华今天可以回家，要我在家等他。我又高兴，又感慨，买了一束鲜花放在花瓶里。我反对他抽烟，但这天我买了包好香烟。因我的结论是“敌性内处”，曾有人好心对我说：“如果重华出来没有任何问题，你要作好思想准备，他会不会同你划清界限离婚。”重华回来了，我们是劫后余

生，相逢如隔世。他已经知道我的处理结果，也知道我在南汇农机厂监督劳动，身体不好。他开朗地对我说：“好在我们还年轻，今后有时间。”又说：“你如果劳动吃不消，没关系，我养你。”他在监房里得了老寒腿的病，下肢血脉不通，夏天上身大汗淋漓，下身没有汗；冬天穿上毛裤、驼毛棉裤还暖不了……有人说此病严重了会截瘫。我陪他去皮货店做了条羊皮裤过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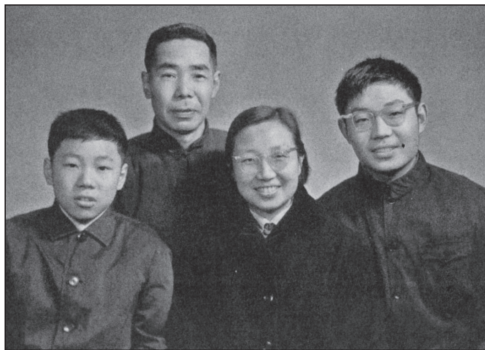
在分配他工作之前，重华在南汇芦潮港五七干校劳动。他又发奋了，每天四五点起床，喝杯克宁奶粉冲冲海边的寒气，就开始阅读《反杜林论》。他怎会料到几年的监狱生活在他身上已留下了更可怕病根。

全家团聚 相濡以沫

重华回来之后，让小林向生产队请假回家团聚，这是小林下乡后第一次回上海。到上海时，重华和我到码头去接他。重华看到他穿得很破烂，对我说“我看了心里很酸”。

小林与外婆感情很深，一放下行李，就说“我想去看外婆”。重华对我说“小林很懂事了”。我已给小林做好驼毛棉袄，那时驼毛和好的布料都不好买，是请我大嫂帮忙的。小林对尺寸和款式不太满意。以后，小林又告诉我：“爸爸提醒我‘妈妈是费了好多心思给你做的，你不要多提意见’。”小林回来后，我们全家到照相馆拍了一张全家照留念。

1972年7月，重华被安置到南汇县农业局，“内部控制”使用。农机局办公室前面院子里有一排平房是免费给家不在本地的干部住宿的，我们也分到了一间。



姚重华学长出狱后全家照

我们的房子很简陋，碎砖铺的地，光线也暗。我们一住进去，就因陋就简，用木板搭床，用竹竿撑蚊帐，桌腿有短缺的就用砖块垫。为了抵抗蚊子“吸血鬼”，重华买了点碎木料，请木匠做了纱窗纱门。他很会动脑筋，周密地营建了这个新窝。我们心里洋溢着喜悦和幸福之感，因为我们可以天天在一起了。

小林仍在黑龙江省插队，有时回来度假。小春不久从上海转学到南汇读书。我和重华经过这次生死劫，心贴得更近。重华的腿有病，但每天早晨总是他跑去食堂打饭，为的是让我多睡一会儿。星期天他洗全家人的衣服、被子，包括我在工厂劳动时穿的那件沾满油污的工作服。周围农业局的干部都对我们很友善，还投来羡慕的眼光。

那几年，重华经常下乡调查情况，并作了细致的统计报表。他在家曾认真阅读司马迁的《报任安书》，要学司马迁忍辱负重仍胸怀大志。这期间，他还读完了《资治通鉴》。他在给一个同学写信时说：“应该好好读点书，准备将来批逆鳞。”这时他已悟到默默地做铺路石子是不够的，还必须独立思考。

和病魔顽强战斗

1974年夏天，他请假去泰州他妹妹那里治疗老寒腿，他妹夫是泰州市医院的院长。经过一个大伏天的针灸推拿服药，疗效十分好。可是好景不长，他嘴唇上的一块黑斑硬化了，作切片化验，确诊是黑色素瘤，存活时间为三个月至三年左右。

这真是个晴天霹雳。我们从医院回到家，我坐在他身边，涔涔泪下，不能自控。他明白我的处境：这时政局还乌云遮天，不知何时能见天日；小林在黑龙江务农，小春还小，他如走了，我一人怎能顶得住。他宽慰我说：“你放心，我的精神不会倒，一定尽最大努力同疾病作斗争。”当天晚上，他鼾声如雷，这鼾声声明了他有极坚强的意志，面临生命威胁仍能坦然深睡。而我那晚则辗转反侧彻夜不眠。

“四人帮”被粉碎后两年，我们被落实政策，调回市区工作，重华到市农委，我到市农机局。离开南汇那天，我们用卡车搬家，来帮忙和欢送的人很多，有南汇农业局的干部，农机厂的工人，亲密的邻居。我们彼此都恋恋不舍。无论如何，回到市区，重华治病要方便多了。

1974年夏，重华在泰州做第一次手术，术后的切片检查确定了病的性质。由于病灶未完全切除，重华接着马上到上海第九人民医院做第二次手术。这次冰冻手术后，他的脸肿得像河马那样大，创口日夜流黄色脓液。嘴巴张不开，吃饭时，他只能用小勺子一小口一小口地喝水吃饭，从此嘴唇烂掉了一角。他坚持吃中草药，每天两碗，吃了八年。1976年，癌转移到左侧颈部淋巴，他再次到九院做手术，切除了41个淋巴结和附近的淋巴管和静脉，颈部的粗细减少了四分之一。出院回家

时，他因头部的血液以及淋巴液循环受影响，整天昏昏沉沉，难受异常。

在病中坚持上班工作

重华在住入华东医院之前，除手术时请病假外，一直坚持在南汇农业局、市农委、复旦大学、市教委办上班。调复旦大学任党委组织部长时（不久任党委副书记），重华已经做了颈部淋巴切除手术。复旦离家很远，路上单趟要两小时。为了避开交通高峰，他每天早晨五点左右就出门去学校。那个阶段，复旦办公大楼第一盏点亮的灯，就是他办公室的灯。不仅如此，许多周末他还自己去加班，不肯休息。

1981年初，他在挤电车上上班的路上发现右臂肱骨断裂。X光检查显示是癌细胞转移所致。这时，他知道自己情况不妙，重华准备截肢，要我买一块小黑板给他，想在病床上用左手练写字。但是经同位素扫描全身骨头，发现他的胸肋骨、腰椎等处也有转移病灶，不宜再做手术。

重华住入华东医院之后，他的病情不断加重，癌细胞转移到腿股骨以至内脏。股骨剧痛，只能不断打止痛针，但止痛的时间越来越短。医生说：“骨头的剧痛非一般人能够忍受，老姚不喊叫一声，这样的病人我过去没碰到过。”

最后的嘱托

在重华病重时，很多同志特地从外地到上海来看他。安毅夫、戴宜生、王平、黄培正、朱厚泽来了，赵西林、姚礼乾代表中共贵阳市委来了。复旦大学谢希德也来了。

记得厚泽专门在上海住了五六天，每天下午三点，是医院探病时间，他必准

时而到，一直陪到傍晚。最后一天，重华对他说：“你明天回贵阳去吧，总有一别！”厚泽在中央党校刚学习结束是从北京来的。重华知道厚泽回贵阳会被重用，临别又加了一句：“你不要忘记人民。”厚泽郑重回答：“绝不会的！”

他看到大家，心情很兴奋，侃侃而谈。他对贵阳的同志再三表示，很想回贵阳看望大家，住上一段时间……在生命将结束的日子，他最想念的地方不是他的家乡杭州，也不是读书、工作过的北京，而是为理想战斗过的贵阳，那里有昔日生死与共的同志。

1981年，伍骅(她的丈夫是尚嘉齐，清华地下党领导者之一，著名历史学家尚钺之子。文革中在吉林工大被迫害致死)来上海看望重华。重华躺在病床上对她说：“你常来上海住，我的家就是你的家。”

重华同弟妹手足之情很深。他的弟弟姚国祥从抚顺赶来看他了。他的妹妹秀娟带着

她的女儿、重华特别疼爱的小意从泰州来看他了。他也与同住上海的大姐梅娟告别。

重华托付好朋友们要代他多多关照我。这时小林和小春都快大学毕业了。他说：“他们年轻，自己会闯，我就放心不下徐琤。”他很想小春能考上研究生。1982年12月，小春由国家保送去美国念研究生了。

重华还对市教委办领导马万杰提出，共产党必须加强自身的建设，必须防止干部队伍腐败变质……关于自己的后事，他要求不开追悼会，不举行遗体告别，不留骨灰。

最后，他没有忘了对医生、护士、理发师、食堂工作人员都表示衷心的感谢。1981年3月6日，重华走了，这一年他才55岁！

以上是我对重华一生的大概回顾。重华度过的是不堪磨难的一生，但他始终心向光明。我有时想，重华是天公派到世上来经受种种灾难考验的人，就像西方的普罗米修斯一样。

我校人文学院教授刘鄂培逝世

我校人文学院教授刘鄂培先生，因病于2018年3月4日在北京逝世，享年90岁。

刘鄂培，1927年3月生于湖北武昌，1952年9月毕业于清华大学哲学系，受业于冯友兰、张岱年、金岳霖等名师。1953年7月中国人民大学马列主义研究生班毕业，此后长期任职于清华大学。1958年被错划为右派分子。1985年调任清华大学思想文化研究所从事教学科研工作。曾任清华大学人文学院教授、岳阳大学客座教授、中华孔子学会秘书长、中国

哲学史学会张岱年学术研究会会长、河北师范大学张申府张岱年研究中心名誉主任等。主要著作有《孟子选讲》《孟子大传》，并主编6卷本《张岱年文集》《综合创新——张岱年先生学记》《张岱年先生学谱》《张岱年哲学研究》《刘鄂培文集》等。

他最重要的贡献在于完整总结了张岱年的“兼和”思想，开创了当代中国哲学的“张刘学派”（张岱年，刘鄂培），并将“兼和”思想写入2008年北京奥运会“中国印”摩崖石刻碑文之中。